

社会保障研究

新农保个人账户财政补贴激励效应研究

金 刚, 柳清瑞

(辽宁大学 人口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 新农保试点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 与“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相比,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并未能比“一刀切”补贴方式更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 试点地区的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了个人账户最低缴费档次。本文利用引入新农保制度和政策信任程度的代际交叠模型, 分析了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提高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激励效应及实现条件, 并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辽宁省调研数据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以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和财政补贴的边际补贴水平为条件, 只有在较高的政策信任程度或较高的边际补贴水平条件下,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才可能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

关键词: 新农保; 个人账户; 政策信任; 补贴激励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3) 01-0092-09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he Financial Subsidy of the Individual Account of the New Rural Pension System

JIN Gang, LIU Qing-rui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about the pilot of New Rural Pension System, the “differentiation” financial subsidy had not been more effective to stimulated peasants to improve their contribution grade than the “one-size-fits-all” financial subsidy. Most peasants of all pilot areas had chosen the lowest contribution grade. Using Life-Cycle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difference financial subsidy and the condition to achieve it. Using the micro data of Northeast China, it did empirical test with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he “differentiation” financial subsidy is based on both the high policy trust degree of peasants’ and the high marginal subsidy level of the “differentiation” financial subsidy. Only

收稿日期: 2012-05-21; 修订日期: 2012-08-14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09&ZD023)、“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研究”(11&ZD01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应对研究”(09&ZD023);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效应研究(11YJC840019)”。

作者简介: 金刚(1976-), 辽宁抚顺人, 经济学博士,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 人口与社会保障。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dequate policy trust degree and marginal subsidy level ,the “differentiation” financial subsidy would stimulate peasants effectively to improve their contribution grade.

Keywords: New Rural Pension System; individual account; policy trust; subsidy incentive

一、引言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其中政府财政补贴是新农保区别于老农保制度最显著的特征。财政补贴主要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对基础养老金的补贴和对个人账户缴费的补贴。新农保个人账户设置了每人每年“100、200、300、400 和 500 元”五个基本缴费档次供参保农民自由选择，尽管《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 号）中指出“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个人账户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30 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而现实情况却是，多数试点地区对个人账户所有缴费档次都采取了“一刀切”补贴 30 元的方式，只有少数地区建立了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例如黑龙江和吉林省实行的是“100 元补贴 30 元、200 元补贴 35 元、300 元补贴 40 元、400 元补贴 45 元、500 元补贴 50 元”的“差别化”补贴方案。新农保试点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参保农民都选择了最低的缴费档次即 100 元/年。例如，安徽省蒙城县调研结果显示参保农民之中选择最低档次每年缴费 100 元的人数占总参保人数的 94.07%^[1]；辽宁阜新彰武县新农保调查数据显示，有 88% 左右的参保农民选择了最低参保档次 100 元^[2]。过低的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选择，意味着较低的新农保替代率水平，如何提高农民个人账户的缴费档次选择，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桑军^[3]、王晓洁^[4]、杨军^[5]、贾宁^[6]等先后提出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档次过低将影响未来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

按照现有的理论研究结果，实行不同财政补贴方式，将引致个体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结果的明显差异。代际交叠理论认为，个人以一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配置生命周期储蓄，在利率水平等参数确定的条件下，青年期消费将为一生收入的固定比率^[7]。这意味着，在“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下，由于个体选择较高缴费档次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因此，个体一生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最高的缴费档次。而如果实行“一刀切”财政补贴，个体选择将会发生变化。哈伯德（Hubbard）^[8]和塞姆维克（Samwick）^[9]等的研究发现，由于养老金必须在个人退休之后才能领取，造成养老保险强制性储蓄的流动性较低，因此，在强制养老保险和私人储蓄的收益率相同的情况下，个人会更偏好于流动性较强的私人储蓄。从这个角度分析，在对不同缴费档次补贴金额相同的“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下，个人会由于对流动性资产的偏好而自发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这个选择结果既可以获得与较高缴费档次相同的财政补贴额，又可以把对流动性的影响降至最低。上述理论结论意味着，“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下，最低缴费档次 100 元/年将是参保农民的理性选择，而如果实行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财政补贴，个人将选择最高的缴费档次，即“差别化”财政补贴能够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许多国内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个人账户缴费“一刀切”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不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参保农民集中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潘书兰^[10]、程昕^[11]等提出通过将“一刀切”财政补贴转变为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来激励参保农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但是，我们针对新农保试点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现实情况与前述理论推论不符，同类地区中个人账户缴费的财政补贴方式差异，并没有显著改善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辽宁省实行“一刀切”财政补贴的地区中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样本比例为 87.58%，实行“差别化”财政补贴地区中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样本比例为 86.21%，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实行“差别化”财政补贴地区中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样本比例为 87.12%^①。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09&ZD023）课题组针对东北地区新农保试点的调研数据统计结果。本文主要使用了辽宁省数据。

我们认为，传统的代际交叠模型建立在个人储蓄能够获得无风险利率水平的假设之上，并没有考虑个体的储蓄风险预期对私人储蓄行为的影响，而个人储蓄风险预期可能是造成目前“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激励效应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针对新农保的研究发现，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较晚、老农保制度停滞、农民对新农保认知程度偏低等原因，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是不完全信任的^[12]，我们针对辽宁省新农保试点情况的调研数据也显示，样本中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平均信任程度仅在“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选择“完全信任”的参保农民比例较低。如果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偏低，其对新农保个人账户未来积累值的期望会相应越低，可能会影响到参保农民对不同缴费档次对其一生收入的判断，并进而影响其缴费档次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可能要受到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影响，面对同样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对新农保政策信任程度不同的参保农民，可能会做出不同的缴费档次选择。因此，分析“差别化”财政补贴提高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激励效应，应该引入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以分析农民在存在风险条件下的选择行为。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尝试在标准代际交叠模型中引入新农保制度及参保农民的政策信任程度，分析“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的实际效应。本文重点将研究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新农保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是否具有激励效应，即改革对不同个人账户缴费档次给予相同补贴的“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为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是否能够有效提高农民参保的缴费档次？二是在何种情况下，个人账户缴费“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才是有效的？这对于解释新农保多数参保者个人账户缴费集中选择最低档次的成因，及制定政策有效解决此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新农保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理论模型

1. 基本模型

我们在代际交叠模型中引入新农保制度和参保农民的政策信任程度来分析农民缴费档次选择行为。假设一个典型的农民个体一生分为两期，即青年期和老年期，个体在青年期获得劳动收入并加入新农保制度，在老年期依靠青年期储蓄和养老金来进行消费。农民在青年期参保时选择何种个人账户缴费标准，将是一种以自身一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行为。假设个体效用函数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不变的形式：

$$U_t = \frac{C_{1,t}^{1-\theta}}{1-\theta} + \frac{1}{1+\rho} \cdot \frac{C_{2,t+1}^{1-\theta}}{1-\theta} \quad (1)$$

其中， U_t 为农民个体一生的效用， $C_{1,t}$ 为青年期消费， $C_{2,t+1}$ 为老年期消费， θ 为风险回避系数（ $\theta > 0$ ）， ρ 为贴现因子（ $\rho > -1$ ）。

考虑农民个体实际参保的情形：如果个体在青年期缴费 T 元（ T 可选）建立个人账户，政府承诺对其个人缴费给予 $F(T)$ 元的补贴一并计入个人账户，并在老年期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同时，给付固定金额为 J 元的基础养老金。但是，农民可能对新农保制度是不完全信任的，为此，引入参保农民对新农保信任程度变量 X （ $X \in (0, 1]$ ， $X=0$ 为完全不信任， $X=1$ 为完全信任）。对于尚处于青年期的个体来说，参加新农保之后，其预期的老年期资产将为：

$$E(A) = S_t(1+r) + X \cdot [J + (T + F(T))(1+r)] \quad (2)$$

其中， $E(A)$ 为参保个体青年期对老年期资产的期望值， S_t 为青年期储蓄， r 为个人账户基金收益率， X 为参保农民对新农保的信任程度。个体面临的跨期预算约束即一生收入现值的期望值^①将为：

① 根据个体青年期和老年期分别面临的预算约束整理求出，证明过程略。

$$C_{1,t} + \frac{C_{2,t+1}}{1+r} = W_t + (X-1) \cdot T + X \cdot F(T) + \frac{X \cdot J}{1+r} \quad (3)$$

其中, W_t 为在青年期获得的劳动收入; $F(T)$ 为政府对个人账户缴费的补贴额; J 为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数额; $X \in (0, 1]$, X 为政策信任程度, 即个体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 新农保个人账户收益率为同期市场利率 r ^①。这样, 在变量 r 、 θ 和 ρ 外生的情况下, 加入新农保制度之后, 个体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 $C_{1,t}$ 和 $C_{2,t+1}$ 都将是其一生收入现值的固定比例^[13]。由于 U_t 对 $C_{1,t}$ 和 $C_{2,t+1}$ 都是单调递增的, 所以个体一生效用最大化问题实际上转化为一生收入现值的最大化问题, 一生收入现值越大, 效用水平越高。在式 (3) 等号右边, W_t 、 r 和 J 作为外生变量出现。因此, 一生收入现值式 (3) 可以表示为农民政策信任程度 X 和个人账户缴费额 T 的函数 $G(X, T)$:

$$G(X, T) = W_t + (X-1) \cdot T + X \cdot F(T) + \frac{X \cdot J}{1+r} \quad (4)$$

2. 财政补贴方式和政策信任程度对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

个人账户缴费数额 T 对 $G(X, T)$ 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frac{\partial G(X, T)}{\partial T} = (X-1) + X \cdot \frac{\partial F(T)}{\partial T} \quad (5)$$

其中, $\partial F(T) / \partial T$ 为个体选择不同个人账户缴费档次时, 财政补贴方案的边际补贴水平。在“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下, 即政府对不同个人账户缴费额提供相同数量的财政补贴, 则 $\partial F(T) / \partial T = 0$; 在“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下, 即政府对较高的个人账户缴费额提供较多的财政补贴, 则 $\partial F(T) / \partial T > 0$ 。式 (5) 说明, 缴费档次选择对一生财富的影响要受到边际补贴水平和政策信任程度的共同影响。如果式 (5) 大于 0, 即提高缴费档次会相应增加个体对一生收入现值的预期, 则参保个体会自发提高其缴费档次选择; 反之, 如果式 (5) 小于等于 0, 即提高缴费档次并不能相应增加个体对一生收入现值的预期, 则个体会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

由于 $0 < X \leq 1$, 因此, 在“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即 $\partial F(T) / \partial T = 0$ 的情况下, 式 (5) 一定是小于或等于 0 的^②, 这说明, 在“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下, 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并不能增加其一生收入现值的预期, 参保农民的理性选择将是最低的缴费档次。而只有在“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下即 $\partial F(T) / \partial T > 0$ 条件下, 式 (5) 大于 0 才是可能实现的。式 (5) 大于 0 的条件是:

$$\frac{\partial F(T)}{\partial T} > \frac{1-X}{X} \quad (6)$$

我们将式 (6) 定义为“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激励效应的实现条件。式 (6) 说明, 只有在“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的边际补贴水平大于由政策信任程度所决定的某一数值时,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才是有效的。从式 (6) 来看, 在政策信任程度确定的情况下,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的边际补贴水平越大,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激励效应越有可能实现; 而在“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的边际补贴水平确定的情况下, 参保农民的政策信任程度越高,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越有可能实现^③。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针对新农保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提出本文的研究命题。

研究命题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以参保农民的政策信任程度为条件, 在确定的边际补贴水平条件下, 如果政策信任程度较高并能够使式 (6) 得到满足,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将比“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显著提高参保农民的个人账户缴费档次; 如果政策信任程度过低而使式

① 符合目前新农保个人账户基金收益率的相关规定。

② $\frac{\partial G(X, T)}{\partial T} = \alpha(X) - 1 \leq 0$

③ $\partial \left(\frac{1-X}{X} \right) / \partial X = -\frac{1}{X^2} < 0$, 即政策信任程度越高, 式 (6) 右边越小。

(6) 无法得到满足, 则“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提高缴费档次选择的激励效应不显著。

三、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实证检验

1. 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结果和本文的研究目的, 我们将计量模型确定为:

$$Contrigrade_i = \alpha_0 + \alpha_1 \cdot Subsidymode_i + \alpha_2 \cdot Trust_i + \beta \cdot X_i + \varepsilon_i \quad (7)$$

首先, $Contrigrade_i$ 表示参保农民选择的个人账户缴费水平。新农保制度规定了整数化的个人账户缴费档次, 我们使用的样本中参保农民所在地设置的缴费档次为 100、200、300、400、500 元等 5 个档次, 因此, 建立虚拟变量 $Contrigrade_i$, 并分别赋值为 1~5 的整数, 1 代表 100 元缴费档次, 2 代表 200 元缴费档次, 3 代表 300 元缴费档次, 4 代表 400 元缴费档次, 5 代表 500 元的缴费档次。上述五个缴费档次是典型的离散变量, 采用概率模型分析离散选择问题是理想的估计方法。并且, 反映缴费档次的离散变量是超过两类的有序离散变量, 因此, 我们选择了有序 Probit 模型 (Ordered Probit) 作为分析工具。用有序 Probit 模型处理多类别有序离散数据是近年来应用较广的一种方法, 其基本方法是假设存在一个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 y_i^* , y_i^* 与解释变量存在线性关系, 在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假定下,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

其次, $Subsidymode_i$ 表示参保农民所在地对个人账户缴费采取的财政补贴方式的虚拟变量。令 $Subsidymode_i = 0$ 代表参保农民所在地对个人账户缴费采取“一刀切”补贴方式, 令 $Subsidymode_i = 1$ 代表参保农民所在地对个人账户缴费采取“差别化”补贴方式。 $Subsidymode_i$ 的系数是我们所主要关注的, 如果“差别化”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是有效的, 那么, $Subsidymode_i$ 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再次, $Trust_i$ 表示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 调查中我们设计了问题“您对新农保的信任程度”, 选择答案包括“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和“完全信任”五个档次, 分别赋值 1~5 的正整数, 其中 1 代表不信任、2 代表不太信任、3 代表一般、4 代表比较信任、5 代表完全信任。

最后, 在有序 Probit 模型中控制了可能影响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选择的其他因素 X_i , 包括居民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承包地面积、家庭收入年剩余等。居民性别中男性赋值为 1, 女性赋值为 0; 年龄, 是居民在调查时的周岁; 健康状况包括农民认为自身健康良好、一般和较差, 良好赋值为 3, 一般赋值为 2, 较差赋值为 1; 教育水平是居民在被调查时的学历程度, 包括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 (专)、大专及以上, 分别赋值 1~5 的正整数; 家庭人口数为居民被调查时的家庭人口数; 承包地面积为居民被调查年度家庭承包地面积; 家庭年收入剩余为居民被调查上一年家庭总收入减去年支出, 包括 5000 元以下、5001~10000 元、10001~15000 元、15001~20000 元、20001~30000 元、30001~50000 元、50001~10 万元、10 万元以上等 8 个档次, 分别赋值 1~8 的正整数。

我们分别对总体样本以及按照不同政策信任程度分组样本进行有序 Probit 估计, 以确定政策信任程度和“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对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效应。我们根据理论分析结果推断, 较高政策信任程度组中“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可能是显著的, 而较低政策信任程度组中“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可能是不显著的。

2.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为了对新农保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需要分别选取实行个人账户“一刀切”和“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地区中参保农民样本。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辽宁大学和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针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中国农村保障水平研究”于 2010~2011 年针对辽宁省开展的一项问卷抽样调查。辽宁省 (除大连) 实行的是个人账户“一刀切”财政补贴, 具体内容为对各个缴费档次均给予 30 元的财政补贴; 大连市

实行的是多缴多补的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具体内容为“100 元补贴 30 元、200 元补贴 35 元、300 元补贴 40 元、400 元补贴 45 元、500 元补贴 50 元”。大连市与辽宁省其他地区在个人账户缴费财政补贴方式上的差异，为我们分析“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的实际效应提供了经验验证的可能。本次调查中，调查地区为阜新市彰武县的平安乡与丰田乡以及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和金州新区七项山镇，调查采取随机入户现场填答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家庭中超过 16 岁的家庭成员。问卷主要分为农民个人及家庭的基本情况、就业与流动迁移情况、收入与消费情况及新农保的参保情况等四个部分，其中，针对新农保制度，我们设计了是否参保、个人缴费档次选择、参保意愿与续保意愿、对新农保的信任程度等多个问题。本次调查共获取问卷 2110 份，去除 60 岁以上已领取基础养老金的老人样本、未参保人群样本以及遗漏变量等原因造成的其他无效样本，我们共获取有效样本 1379 份，其中，阜新市问卷 741 份、大连市问卷 638 份。调查样本点的具体分布状况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点分布状况

县市名称	乡镇名称	样本数（个）	财政补贴方式
阜新市彰武县	平安乡	352	一刀切
	丰田乡	389	一刀切
大连市甘井子区	营城子镇	326	差别化
大连市金州新区	七项山镇	312	差别化

表 2 为本文使用变量的统计描述。表 3 和表 4 是本文使用样本主要变量分类别的统计分析结果。从全部样本的缴费档次选择来看（见表 3），选择最低缴费档次 100 元的参保农民比重最高，占 86.95%；其次为 500 元档次，占 6.16%，以下依次为 200 元档次、300 元档次、400 元档次。“一刀切”补贴地区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比例略高于“差别化”补贴地区，前者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参保农民比重为 87.58%，后者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参保农民比重为 86.21%。从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来看（见表

表 2 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名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缴费档次	1379	1.34	0.47	1	5
财政补贴方式	1379	0.46	0.50	0	1
政策信任程度	1379	3.88	0.77	1	5
性别	1379	1.32	0.47	1	2
年龄	1379	44.15	9.25	17	59
教育水平	1379	2.97	0.76	1	5
健康程度	1379	2.65	0.59	1	3
家庭人口数	1379	3.93	1.28	1	8
家庭承包地面积	1379	20.00	14.43	0	170
家庭收入剩余	1379	1.43	0.87	1	6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课题组对新农保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整理。

4)，平均水平处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但接近“比较信任”水平，并且，“一刀切”补贴地区与“差别化”补贴地区中参保农民的平均政策信任程度接近。

表 3 参保农民缴费档次的分布情况

项目	个人账户缴费档次选择（%）					平均值（元）	观测值数（个）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全部样本	86.95	4.35	2.10	0.44	6.16	134	1379
“一刀切”补贴地区	87.58	4.32	2.02	0.13	5.94	133	741
“差别化”补贴地区	86.21	4.39	2.19	0.78	6.43	137	638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课题组对新农保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整理。

表 4 参保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信任程度的分布情况

项目	不信任（%）	不太信任（%）	一般（%）	比较信任（%）	完全信任（%）	平均值	观测值数（个）
全部样本	0.51	5.58	17.19	58.96	17.77	3.88	1379
“一刀切”补贴地区	0.54	5.53	16.60	59.51	17.81	3.89	741
“差别化”补贴地区	0.47	5.64	17.87	58.31	17.71	3.87	638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研究”课题组对新农保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整理。

3. 有序 Probit 估计结果

利用 Stata11.0 软件对计量模型式（7）进行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在回归结果中同时列出了各解释变量对不同缴费档次选择概率的影响即边际效果。总体样本计量分析结果见表 5。

表5 总体样本的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总体样本 (不含控制 变量)	总体样本	边际效果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财政补贴方式	0.061 (0.72)	0.052 (0.61)	-0.010 (-0.61)	0.003 (0.61)	0.002 (0.61)	0.0003 (0.58)	0.006 (0.61)
政策信任程度	0.134 ** (2.26)	0.141 ** (2.21)	0.028 ** (-2.22)	0.008 ** (2.19)	0.004 ** (2.02)	0.001 (1.62)	0.015 ** (2.21)
性别		-0.040 (-0.43)	0.008 (0.43)	-0.002 (-0.43)	-0.001 (-0.43)	-0.0003 (-0.42)	-0.004 (-0.43)
年龄		-0.003 (-0.55)	0.001 (0.55)	-0.0002 (-0.54)	-0.0001 (-0.54)	-0.00002 (-0.54)	-0.0003 (-0.55)
学历		0.294 *** (4.69)	-0.058 *** (-4.75)	0.016 *** (4.09)	0.009 *** (3.56)	0.002 ** (2.22)	0.031 *** (4.65)
健康状况		0.046 (0.58)	-0.009 (-0.58)	0.003 (0.58)	0.001 (0.59)	0.0003 (0.57)	0.005 (0.58)
婚姻状况		-0.327 * (-1.85)	0.065 * (1.85)	-0.018 * (-1.82)	-0.010 * (-1.75)	-0.002 (-1.48)	-0.035 * (1.84)
家庭人口数		0.084 ** (2.30)	-0.017 ** (-2.31)	0.005 ** (2.23)	0.002 ** (2.12)	0.001 * (1.73)	0.009 ** (2.29)
承包地面积		-0.007 (-1.49)	0.001 (1.50)	-0.0004 (-1.48)	-0.0002 (-1.41)	-0.00004 (-1.45)	-0.001 (-1.50)
全家收入剩余		0.118 ** (2.49)	-0.023 ** (-2.50)	0.007 ** (2.44)	0.004 ** (2.28)	0.0008 * (1.78)	0.013 ** (2.45)
观测值数	1379	1379					
瓦尔德统计值	Wald chi2 (2) = 5.36 *	Wald chi2 (10) = 49.99 ***					
对数似然值	-733.91	-707.30					
伪拟合系数	0.0045	0.0406					

注: **、*、*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是 z 值。

总体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政策信任程度、学历水平和家庭收入剩余对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符合理论与逻辑推断结果;回归结果还同时发现,未婚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显著高于已婚农民,家庭人口数对于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这可能与参保农民对于未来应对风险能力的预期和家庭收入的稳定性有关。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计量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包含控制变量,“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并不能比“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显著提高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可能是无效的。

但是,根据我们前述理论分析结果,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可能要受到政策信任程度的影响,由于总体样本的平均信任程度仅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因此,总体样本估计结果中“财政补贴方式”系数的非显著性有可能是总体样本的政策信任程度偏低造成的。

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并对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研究命题进行进一步验证,我们按照参保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信任程度”的高低对样本进行分组并分别进行有序 Probit 估计。我们列出了三个样本组的估计结果,分别是政策信任程度最高的“完全信任”的样本组、政策信任程度较高的“比较信任”的样本组和政策信任程度为“完全信任”之外的样本组,估计结果见表 6。

表 6 中数据显示,在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完全信任”样本组中,“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完全信任条件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可以比“一刀切”方式有效激励参保农民的

表 6 按照“政策信任程度”划分的样本组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样本组	解释变量	对应样本	边际效果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政策信任程度为“完全信任”的样本组	财政补贴方式	0.452 ** (2.34)	-0.113 ** (-2.31)	0.022 ** (2.04)	0.016 * (1.77)	0.010 (1.44)	0.064 ** (2.24)
	观测值数	245					
	瓦尔德统计值	Wald chi2 (9) = 33.9 ***					
	对数似然值	-158.08					
	财政补贴方式	-0.039 (-0.33)	0.007 (0.33)	-0.002 (-0.33)	-0.001 (-0.33)	-	-0.004 (-0.33)
政策信任程度为“比较信任”的样本组	观测值数	813					
	瓦尔德统计值	Wald chi2 (9) = 57.77 ***					
	对数似然值	-367.78					
	伪拟合系数	0.0838					
	财政补贴方式	-0.060 (-0.60)	0.010 (0.60)	-0.003 (-0.60)	-0.002 (-0.60)	-0.0002 (-0.56)	-0.005 (-0.60)
政策信任程度为“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和不信任”的样本组	政策信任程度	0.015 (0.18)	-0.003 (-0.18)	0.001 (0.18)	0.0004 (0.18)	0.00004 (0.18)	0.001 (0.18)
	观测值数	1134					
	瓦尔德统计值	Wald chi2 (9) = 65.28 ***					
	对数似然值	-520.26					
	伪拟合系数	0.0666					

注: ***, **, *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是 z 值; 控制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略。

缴费档次选择; 从边际效应来看, “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转变为“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可以使参保农民选择最低 100 档次的概率下降 11.3%, 而选择 200、300、400 和 500 元档次的概率分别上升 2.2%、1.6%、1.0% 和 6.4%, 特别是, “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使参保农民选择最高档次 500 元的概率明显高于选择 200~400 元档次的概率, 这也可以间接证明前述我们提出的参保农民为了最大化其一生收入将选择最高的缴费档次的分析结论。在参保农民的政策信任程度低于完全信任时, “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显著性发生明显变化。估计结果显示, 政策信任程度为“比较信任”的样本组, “财政补贴方式”系数不显著; 同时包含政策信任程度为“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和不信任”的样本组中, “财政补贴方式”的系数也是不显著的。表 6 中的估计结果较好地验证了我们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研究命题, 即“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是以参保农民的政策信任程度为条件的, 在确定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下, 只有在参保农民政策信任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 财政补贴方案的激励效应才可以实现。

理论分析中我们提出“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激励效应的实现条件为式 (6) $\frac{\partial F(T)}{\partial T} > \frac{1-X}{X}$ 。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 大连市实行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内容为“100 元补贴 30 元、200 元补贴 35 元、300 元补贴 40 元、400 元补贴 45 元、500 元补贴 50 元”, 在这个方案下, 式 (6) 左边“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的边际补贴水平 $\partial F(T) / \partial T = 0.05$, 式 (6) 成立要求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信任程度要超过 95.24%。我们认为, 由于大连市实行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的边际补贴水平较低, 从而造成总体样本以及政策信任程度低于“完全信任”的样本的估计结果中“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无效。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基于引入新农保制度的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理论模型, 得出了

“在参保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信任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将比‘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显著提高参保农民个人账户缴费档次”的理论命题。其次，根据针对辽宁省大连市和阜新市新农保试点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方法，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基本结论是，新农保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可能具有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的效应；但是，“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激励效应是否有效，要受到边际补贴水平和政策信任程度的共同约束，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政策信任程度越高以及财政补贴方案的边际补贴水平越高，“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就越有可能实现。政策调整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政策信任程度，二是实现“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向“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转变，并同时提高“差别化”财政补贴的边际补贴水平。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高广大农民对新农保的政策信任程度。首先，综合运用集中讲解、社区宣传、入户解读、参保农民经验推广等多种宣传形式和手段，增强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感受度、了解度、接受度与认知度。其次，强化新农保政策解读，使广大农民切实理解个人账户缴费的重要性和安全性，以及不同缴费档次对未来收益的真实影响。第三，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层管理和服务的队伍建设，规范包括新农保在内的各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和流程，通过增加经办透明度、公开财务数据等各种手段，提高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程度。第四，完善新农保配套制度建设、优化新农保相关制度规定。例如，应适时停止目前“制度实施时年满 60 周岁老人领取基础养老金，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的“捆绑式”缴费规定，尽管此项规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扩大新农保覆盖率的作用，但是却影响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本身的正确认识。

二是将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的财政补贴方式正式确定为多缴多补的“差别化”补贴方式。第一，在实现机制上，制定并出台具体政策在全国范围统一明确新农保个人账户缴费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模式。第二，在具体方案设计上，按照“降低绝对补贴额同时拉大不同档次之间的补贴差距”的原则，在各缴费档次的财政补贴标准之间设置合理且有效的差距来确保方案的激励效应。例如，可以实行“100 元补贴 10 元、200 元补贴 20 元、300 元补贴 30 元、400 元补贴 40 元、500 元补贴 50 元”的“差别化”财政补贴方案。

参考文献：

- [1] 黄明静. 农户参加新农保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蒙城县立仓镇的调研 [J]. 长春大学学报, 2011, (5).
- [2] 程昕, 王国辉等. 新农保缴费问题的研究——基于阜新市彰武县 4 个乡镇的新农保调查 [J]. 农业经济与科技, 2011, (6).
- [3] 桑军.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调查研究——以安徽省蒙城县为例 [J]. 安徽农业科学, 2011, (19).
- [4] 王晓洁, 王丽.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财政补贴效应分析 [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9, (4).
- [5] 杨军.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模式研究——以陕西省宝鸡市为例 [J]. 西部财会, 2009, (9).
- [6] 贾宁, 袁建华. 基于精算模型的“新农保”个人账户替代率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 (3).
- [7] 戴维·罗默. 高级宏观经济学 [M]. 苏剑, 罗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99.
- [8] Hubbard R. Glenn. Uncertain Lifetimes, Pensions, and Individual Saving [R]. Working Paper No. 13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4.
- [9] Samwick Andrew A. The Limited Offset between Pension Wealth and Other Private Wealth: Implications of Buffer-stock Saving [R]. Mimeo, 1995.
- [10] 潘书兰. 农户参加新农保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蒙城县立仓镇的调研 [J]. 武汉金融, 2011, (4).
- [11] 同 [2].
- [12] 王海江. 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关于山东泰安市两个村农民的个案研究 [J]. 人口研究, 1998, (4).
- [13] 同 [7].

[责任编辑 方 志]